

今年初出版发行的《彭康文集》，收录文稿时间跨度从1927至1965年，上册主要收录彭康先生的论著和译著，下册则囊括彭康在文化、教育、党建等多方面的报告、讲话等。

彭康先生早期留学日本，后回国投身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华中党校校长等党内职务。1952年，他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1959年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彭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是与时代发展洪流紧密结合的一生。

《彭康文集》上册突出反映了彭康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在《哲学的任务》中，他认为哲学本是无所不包的学科体系，是社会中最高的理论支撑，更是在社会建设中指导着社会实践。但现实中的哲学，却丧失了社会指导的意义，成为一门艰深的学科。这主要缘于两大原因：其一，哲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复杂，与现实距离愈发疏远；其二，哲学是社会的上层构造，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社会的根本构造是下部。彭康认为，要完成变更世界的社会实践，哲学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工具，而普罗列塔利亚特才是核心所在。普罗列塔利亚特源自英文中proletariat的汉语音译，原指古罗马时代社会中的最下等阶级，文中语境应指无产阶级。故而，彭康提出：“哲学要变更世界所需的社会实践心脏就是无产阶级力量。”



《彭康文集》  
《彭康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 彷徨与抉择

——《彭康文集》中命运的时代感

■杨孟哲



▲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的任命通知书。

▲彭康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则是作者针对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盛行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一次直接回应。这次论战双方分别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事件起因是1923年张君勱发表《人生观》，提出科学虽是客观存在，却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法，人生观不受科学的影响和支配。丁文江随即发文反驳张君勱的看法，认为人生观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根本不存在不受科学影响的人生观。彭康先生认为，张君勱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论，既不承认社会现象之间

的因果联系，也不认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丁文江和胡适等人的观点看似比张君勱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就是认为科学决定一切，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彭康对两方的唯心主义论点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进而提出，唯有树立唯物论的辩证法思想，才能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

《彭康文集》上册集中反映了彭康关于哲学和革命文化方面的思考。从这些哲学文化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念。彭康认为，哲学不能只停留在解释哲理的层次，而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施行改变世界

的活动。抗战初期，彭康即发表文章表达对于抗战的坚定决心。他提出，当前阶段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要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就必须进行革命。但日本的侵略导致中国内部的矛盾退让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抗战则成了既要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也有在抗战中谋求内部矛盾解决的诉求。彭康认为，抗战不仅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还能为国内革命创造先决条件。

1945年后，彭康负责华东局和山东解放区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彭康既有工作上的具体要求，比如他要求报纸编辑必须克

服经验主义，又有新的主张与实践，比如他认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可以首先通过干部教育，在各级党校、党训班中通过学习来提升大家对组织的思想认识。彭康进一步提出，党性就是要无私、有纪律、有集体观念。有些人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都是忽视了党性。他指出，要加强党员的组织生活，提高党员的纯洁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把党和革命的利益放在首位，党员群体要有高度的原则性、纪律性和自律性，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彭康出任交通大学校长。西迁是交通大学历史发展中的浓重一笔，彭康的观点是，首先，迁校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实施的，是对我国西北建设的重大支援，西安虽在城市和工厂企业方面不如上海，但迁到西安比留在上海更为有利；其次，迁校不会影响生源质量。1957年7月，彭康向全校师生介绍了迁校新方案，进而提出交通大学将分设两地。1959年，两校分别独立办学。此后，彭康正式执掌西安交大。

通读《彭康文集》，既被作者深厚的哲学底蕴所折服，而他所提出的党建思想和带领交大师生开创的西迁精神，对现今时代也有着弥足珍贵的思考和借鉴意义。彭康将自身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融合，也真实再现了他胸怀大局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

## 孤独而细腻的观察者

——阮庆岳和他的《声音》

■戴欣倍

第一次看到“阮庆岳”这个名字，是在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的网站上，阮庆岳是那一届的建筑评论奖得主。后来，在网上查阅资料，看到他在大陆出版的一些有关建筑文化类的书籍，诸如《下一个天际线：当代华人建筑考》《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城市漂流：关于三个城市的十二个建筑思考》等，便开始关注他和他的作品。

阮庆岳的身份如同他的作品一般多元：建筑评论家、作家、策展人，以及中国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作为作家，他是高产的，包括《林秀子一家》《凯旋高歌》《苍人奔鹿》《秀云》《神秘女子》，而今其最新随笔集《声音》也在大陆引进并出版了。

《声音》并不是阮庆岳之前经过整体构想而写的一本书，而是他平常偶尔想到的一些体悟和感想，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建构什么。一些成长的记忆、日常的生活、远远近近的亲友，正是在这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

阮庆岳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声音》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叙述他处于病者的状态和角度观察世界。当你作为病者的时候，声音对你而言，会显得幽微，你会听到比较多的声音。而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就听不见那些声音了。所以“声音”这个书名呼应了阮庆岳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病者的心理活动和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很

多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也不能出去，只能凭着声音去想象家人和外面的状态。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他的游牧世界，倾听他在记忆与冥想、哲思与日常、建筑与文学之间织就的暗语。它们清冽又温润，触发着每个人心底的回应。

阮庆岳出生在台湾省南部靠近垦丁的一个小镇——潮州。准确地说，他生命中的前1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10岁后，他随同家人搬到台北，住在民生社区的富锦街上，之后就在台北成长、生活。而童年的成长经历在阮庆岳的记忆里非常深刻，对他个人的影响也很大。

在淡江大学念书时，他的生活过得比较拮据。当时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衣橱。那时候他常常坐在床上，靠着窗边，看着上下学的人流在路上来来往往。大多时候，他在房间里看书，看到喜欢的句子就会站起来在墙上写下来，后来整个墙上都被他写满了，然后他就用便利贴往墙上贴，最后也贴得满墙都是。

虽然大学的生活比较拮据，但他总会省下点钱来买书。当时他住的房子对面有一个书店，他常去那里买书。有时候，太贵太厚的书买不起，就托一个在书店打工的同学将他想看的那本书在下班时带回来，晚上抓紧时间看，第二天再让同学还回去。他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一直在阅读。

后来，阮庆岳赴美念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后，没过多久他就病倒了，因为没有买保险，他就一个人躺在屋子里，断食三天，以此来自我疗愈。躺着很无聊，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就看书。之后很多次，逢到他生病了，就常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自我疗愈。大量的阅读为阮庆岳的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基础，他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作品，也获得了台湾文学奖散文首奖、短篇小说推荐奖等奖项。

《声音》可以说是具有浓郁个人写作色彩的随笔集。书中的文字清晰有力又极其精确，把我们引入阮庆岳深入而细微的观察、思考和判断中。他的文字没有匠气，有些章节读来就像简单地描述一件事而已，但寥寥数语间，就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转而思考自己的人生。

阮庆岳是孤独的。在《孤独就是我的本质》中，他说：“孤独是我的本质。我虽自觉是蛹是鹰，却也常假目以蝶以雁的姿态存活人间。”由于无法选择全然出世，对入世依旧有着某种眷恋。阮庆岳的文学创作大抵也是对这矛盾与困境的自我叩问。我想，他一定非常珍视孤独的时刻，许多幽微的价值，都是源自于此，他因此也一直在努力学习与孤独共处。

阮庆岳也是细腻的。人的内心其实都是寂寞的，但很多人擅于掩饰自己，很少将自己的寂寞呈现于外。在《移动，在寂寞的



《声音》  
阮庆岳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地方》一文中，那个脸是那么寂寞的老人让人唏嘘，哪里是脸寂寞？明明是心寂寞。但阮庆岳并没有直接说他心寂寞，而是说他脸寂寞，这种直观的寂寞，让人更为心痛。

观察者如阮庆岳，他对声音的敏感，就如对自我的敏感，简单又直接。在阮庆岳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对生活的随性或自在，总是以豁达的态度理解着不如意或复杂的存在。就如同他对那些不入耳的声音的态度，或许它们还没找到自己融入自然的方式，或许是我们还没空出这些声音可以进入的位置。隔离尘世的生活是他想要的，但他又从现实中理解到这种简单并不容易，于是他想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生活”来化解，出世和入世的反复缠绵。阮庆岳的《声音》就是如此！

年逾一甲子，回眸过去，充满了一种世事沧桑的从容感，阮庆岳平静地叙说着人生几十年里的种种过往，无论是以往的何种情形，均能以一种温和的笔调娓娓道来，将生命中的各种回忆再一一拾起。声音本是纯然的，如此便是阮庆岳的世界。